

中国社会科学院

学术大师治学录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

学术大师治学录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大师治学录/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9

ISBN 7 - 5004 - 2551 - 1

I. 中… II. 中… III. 社会科学 - 科学工作者 - 生平事迹 -

中国 - 现代 IV. K8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46666 号

策划组织 郑文林

责任编辑 郑文林

装帧设计 朱虹

责任校对 李小冰

责任印制 郑以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北京兆成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25.25 插页: 2

字数: 604 千字 印数: 1—3 500 册

定价: 55.00 元

序

我祝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大师治学录》的出版，并十分高兴地向读者推荐这本书。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的最高研究机构，这里集中了一批国内外知名的学者，他们是我国学术理论界的前辈，对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和国家的文化建设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可以称得上是大师级的人物。将他们的治学成果、治学经验和优良学风加以总结集中介绍给大家，对弘扬先进的学术思想和优秀的民族文化，提高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水平，启迪和教育年轻一代学人，都有着重要的意义。恩格斯说过：“一个民族要想登上科学的高峰，究竟是不能离开理论思维的。”可见，繁荣和发展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事业，对于我们要想登上科学的高峰，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学术大师们的治学成就是极为辉煌的，他们各自在文、史、哲、经等众多学科领域都有里程碑式的卓越建树。他们

中有的因为重大的学术发现，在一片荒地上开辟出新的路径，建立起新的学术领域，成为新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有的在原有学科的小径上披荆斩棘，因为自己的学术创新观点，变崎岖的小径为宽阔的通途，使原有学科大步向前推进了，发展了；有的为原有学科增添了丰富的资料和养分，从而使原有学科变得丰满和成熟；有的则因引进了新的研究方法，使原为平静无奇的学科和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学科，转瞬间出现柳岸花明又一村的局面。在书中我们还会看到，多数学术大师的成就并不局限于某一方面，而是横跨几个领域，令人惊奇和称羨。总之，这些学术大师是为振兴祖国的学术事业，为新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的许多学科的建立、成长、繁荣、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的人，值得我们永远记念他们。

从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学术大师们一些鲜明的治学特点或者说他们的治学经验。首先是他们崇高的学术愿望。这种愿望是要使祖国尽快振兴起来的愿望，是要使中华民族永远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愿望。用郭（沫若）老的话来说，是要有一种“中国人应该自己起来，写满世界文化史上的白页”的志向。这个志向和愿望鼓舞着他们在荆棘丛生的学术道路上不畏艰难险阻，勇往直前。这种愿望和志向在许多学术大师那里体现为一种对民族和社会的深切关怀。

其次是敢于创新的精神。创新是学术的生命，在任何一个学科领域，如果没有新的观点、新的发现、新的资料、新的方法，学科就会停止在原地。一切科学创新都带来新的发展，一切发展都是创新的结果。创新精神是学者的一种深切的学术关

622 54/26 12

怀，一个学者如果没有了创新的愿望和要求，他在学术上就不可能再有作为，也就是停止了自己的学术生命。学术大师们之所以被人们尊为学术大师，就是因为他们具有强烈的创新精神和不断的创新贡献。

第三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这种态度正如有的大师所说的，“在学问上只当问然不然，而不问善不善”的态度。科学只是追求真理，而不问对谁是否有利，只要认为真理在自己手中，纵使有千万人反对，也要勇往直前。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真理观。这种世界观、真理观与无产阶级的价值观是统一的。因此，科学上所追求的真理，对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总是善的、有利的。

第四是学术大师具有的深厚功底。这种功底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功底。要研究文史哲经任何一种学术，不熟悉和不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不可想象的，可以说花果的鲜硕和贡献的大小，与其在传统文化上的功底是相关的。

第五是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也就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学术大师中许多人是共产党员，不少人长期担任领导职务，他们很自觉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从事学术研究；有的学术大师在建国前的研究虽没有明确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思想，但他们的实际研究工作是运用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和方法的。现在有一种看法，认为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研究工作会限制学者的创造精神，这种看法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一定要坚决贯彻江泽民同志题词精神，一定要把中国社会科学院办成马克思主义的坚强

阵地。

现在我还想强调说说学术大师们为人称道的优良学风。首先是有的放矢的学风。这就是说，学术研究要从实际出发，要从解决实际中的问题出发。这些问题或者是社会实践中向学术提出的问题，或者是学术本身发展中凸显出来的问题，学术研究是为解决这些问题而展开的。研究的结果使理论得以向前发展，回到实践则可以解决实践中的问题。即使像历史学理论的研究，如刘大年同志所说，也应该是“讲过去的事，回答现在的问题，瞻望未来，是历史科学的基本特点”。其次是研究工作要占有翔实资料的学风。这意味着从事任何问题的研究，必须掌握前人和今人对该问题的研究成果，还要尽量多地掌握有关史料，并且对某些史料还必须进行一番怀疑、辨伪、考信的工作。那些不想在占有翔实资料上下功夫，企图走捷径的做法是徒然无成的。第三是学术研究还要有敢于自我批判的学风。批判别人的理论或观点做到有理有据尚且不易，要批判自己的学术观点或理论就更难了。我们的学术大师把自我批判称为“自省”，认为“学贵有自得，亦贵有自省，二者相因，不可或缺，前者表现为科学探索精神，后者表现为自我批判的勇气”。第四是不畏艰险，勇于攀登的学风。按照马克思的说法，科学研究是在崎岖的小路上攀登，只有那些不畏艰险，勇于攀登的人，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用我们学术大师的话来说，他们选择的的就是“咬住青山不放松”的精神，是“只顾攀登不问高”的精神。第五是严谨的学风。他们的论文、著作，他们的观点、理论，都是通过全面收集材料，进行周密论证，冥思苦

索，反复推敲，直到认为无懈可击才提出和发表出来的，总是力图做到颠扑不破，万无一失。这样的研究成果，是经过了千锤百炼的成果，因而能够到达一个学术的高峰。学术大师们的优良学风还有许多，这里不再赘述。

读者阅读这本书，当会发现书中的每一位学术大师都为祖国的振兴，为学术的繁荣做出了辉煌的贡献，他们伟大的学术风范，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与学术大师的治学风范相对照，这些年我们学术界确实存在一种浮躁的学风。这种学风企图不经过自己艰苦的探索而希望做出惊人的成果，表现为一种急功近利的情绪。浮躁乃治学之大敌，误己害人，终无一成。我希望一切有志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事业的同志们，以学术大师们为榜样，坚决摒弃不良的学风，以实际行动，为繁荣我国的学术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李锐

1999年9月

序

郭沫若 Guo Moruo	001
胡乔木 Hu Qiaomu	025
马 洪 Ma Hong	059
胡 绳 Hu Sheng	083
潘梓年 Pan Zinian	117
范文澜 Fan Wenlan	139
陈 垣 Chen Yuan	161
陆志韦 Lu Zhiwei	181
金岳霖 Jin Yuelin	205
陈翰笙 Chen Hansheng	225
郑振铎 Zheng Zhenduo	247
罗常培 Luo Changpei	267
吕振羽 Lu Zhenyu	291
侯外庐 Hou Wailu	315
吕叔湘 Lu Shuxiang	339
冯 至 Feng Zhi	359
许涤新 Xu Dixin	393
尹 达 Yin Da	413
钱俊瑞 Qian Junrui	433

周 扬 <i>Zhou Yang</i>	455
骆耕漠 <i>Luo Aenmo</i>	473
丁声树 <i>Ding Shengshu</i>	493
夏 鼐 <i>Xia Nai</i>	513
狄超白 <i>Di Chaobai</i>	541
季羨林 <i>Ji Xianlin</i>	557
何其芳 <i>He Qifang</i>	579
向 达 <i>Xiang Da</i>	605
刘大年 <i>Liu Danian</i>	625
于光远 <i>Yu Guangyuan</i>	651
顾颉刚 <i>Gu Jigang</i>	675
俞平伯 <i>Yu Pingbo</i>	701
罗尔纲 <i>Luo Ergang</i>	727
贺 麟 <i>He Lin</i>	747
钱钟书 <i>Qian Zhongshu</i>	775
后 记	799



郭沫若

(1892—1978)

著名的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作家和诗人。曾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主任。

郭沫若出生于四川乐山。学名开贞，1919年9月首次署名沫若。20年代中期，开始使用“鼎堂”一名。1914—1923年，走着一条从立志学医到弃医从文之路，出版诗歌集《女神》，开一代诗风，确立在新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1924年，初步转向马克思主义方面来，经瞿秋白推荐、林伯渠具体安排，1926年应聘为广东大学（不久改为中山大学）文科学长。随即投笔从戎，参加北伐，历任北伐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少将军衔）、副主任（中将军衔）。1927年3月底写成《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发表，8月初赶赴南昌参加武装起义，经周恩来、李一氓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1937年，在日本“走了他应该走的唯物主义的研究道路”，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史学的开拓者，并奠定了在甲骨文、青铜器研究领域内大师的学术地位。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别妇抛雏”秘密回国，投身抗日洪流。根据中共中央的安排，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后为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一方面撰写大量政论性的文章，一方面在学术研究和文艺创作上取得重要成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连选连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二、三、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相继当选为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主席，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出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兼历史研究所所长，又当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主席。1954年以后，连选连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郭沫若还是中国共产党第九届、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作为国务活动家和世界和平使者，耗去大量时间和精力。但从政之余，仍然努力实践着在学术研究和文艺创作上“努力攀登不问高”的誓言。

●

一

作为世界文化名人、学术大师，郭沫若在步入文坛不久即已形成以中国文化为基点的世界文化观和跳出“国学”范围的中国文化体系，并长期贯穿在学术文化活动中，推动和影响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

从童年和学生时代可以看出，郭沫若对于传统文化的接受基本上是从感情的喜好出发的。8岁时读唐诗和司空图的《诗品》，后来关于诗的意见大体上是受《诗品》的影响。9岁左右就产生出一种连他本人都感到“有点奇怪”的现象——喜欢李白、柳宗元，而不怎么喜欢杜甫，更“有点痛恨”韩愈。进入本世纪的最初几年，开始大量接触新书刊，读古书也比较有条理了。同时，养成日后好议论和好做翻案文章的“脾气”。17岁前后，林琴南的翻译小说成为他所嗜好的一种读物，以致对其后来的文学倾向有决定的影响。如果说报考天津陆军军医学校是想取得官费离开四川，那么到日本留学选择医科则是受“富国强兵”时代的影响。然而，当时的德文教员以文学士居多，尤其喜欢采用德国的文学作品为课本，郭沫若本已决心抛弃的文艺倾向又被“煽动”起来，并使他将旧文艺和新文艺深深地结合在一起。在日本的学医生活，基本上被诗歌创作、文学活动所取代。因为喜欢歌德、泰戈

尔，便和哲学上的泛神论思想接近了。泛神论思想不仅影响他的诗歌创作和对中国古代神话的认识，还表现在他对先秦诸子的论述中。

当由感情的喜好逐渐进到理性的追求时，郭沫若的心路告诉人们，他与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们有着两个最大的不同之处。一是他没有像多数人那样直接接受国外关于改造社会的思想学说，只是在寻求国外文化与传统文化的相通之处。二是在打倒“孔家店”的高潮时期，他身居日本这样一个既有东方传统又善于吸收西方科学的国度中，一面表现出对西方文化的狂热崇拜和追求，一面又使他得以用“旁观者”的态度冷静地对待中国“固有的文化”，形成影响他日后思想认识和学术研究的独特的世界文化观。他既不主张“全盘西化”，又不固守“文化本位”，而是强调中外文化“合璧”，既要唤醒我们固有的文化精神，又要吸吮欧西的“纯粹科学的甘乳”。

如何认识和“吸吮欧西的纯粹科学的甘乳”，郭沫若有过两次重大的选择。第一次选择如果是凭着感情的喜好，创作了白话诗《女神》，开辟出新文学的发展路径；那么当他进到理性的追求时，瞩目“欧西的纯粹科学的甘乳”的目光便集中在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学说上，并且注意到辩证唯物论的“阐发与高扬”已经成了“中国思想界的主流”，于是以中国的国情、中国的传统来考验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的适应度，写下又一部具有开拓意义的著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代表着新史学发展的方向。

从此以后，郭沫若的学术研究大体可以如此划分：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以甲骨文和青铜器等古文字、古器物为基础，进行中国古代社会研究；30年代后期至40年代中，一面配合历史剧创作进行历史人物研究，一面纵论先秦诸子思想学说；50年代，主要精力放在古代社会分期问题和古籍整理方面；60年代则以历史人物研究与历史剧创作影响着当时的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领域；在50—70

年代的20余年间，随时都有对于古文字、古器物的单篇考释或研究论文发表。

这中间，要特别提到郭沫若关于“科学的中国化”的思想。他认为：“今天要接受科学，主要的途径应该是科学的中国化。”^①这一思想既融会在他的世界文化观之中，又包含着“以大众化为其目标，以文学化为其手段”和以“政治的民主化以为前提”的完整内容。直至逝世之前，他的最后心声依然是：“我们一定要打破陈规，披荆斩棘，开拓我们科学发展的道路。”^②

在以中国国情考验外来思想文化之际，郭沫若即已明确提出：中国人应该自己起来，“写满”世界文化史上的白页。50年代以后，他的世界文化观进一步理论化。如果对他的整个学术道路作一概括性总结的话，可以说自1919年至1978年的60年间，他正是不断引进外来思想，以中国的传统考验其适应度，吮吮其科学的甘乳，促进民族新文化的创造，再走出去，填写世界文化史上的白页。

二

1928年3月，郭沫若亡命日本，得以比较客观地潜心于对传统文化的考察。在从事国外理论与学术文化著作的翻译过程中，逐渐意识到简单地把历史唯物论只作为纯粹的方法来介绍，生硬地玩弄一些不容易理解的译名和语法，反而会使其在接受与运用上增加障碍。因此，他采用了围绕“国学”介绍“国学”的做法，使历史唯物论“中国化”。同时发现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① 《“五四”课题的重提》，《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44—545页。

② 《科学的春天》，《人民日报》1978年4月1日。

“没有一句说到中国社会的范围”，便决心以这部名著为“向导”来撰写“续篇”，在恩格斯所知道的美洲印第安人、欧洲古代希腊、罗马之外，提供出“他未曾提及一字的中国的古代”。

1928年7月底8月初，郭沫若与古史辨派“不期而同”，从“文籍考订”入手打开“层累地造成”的《周易》这座神秘的殿堂，写出《周易的时代背景与精神生产》（后改名《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紧接着，又推出《〈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之反映》。两篇文章，反映郭沫若对中国古代由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变革的最初认识。在写作过程中，他感到《易》、《诗》、《书》中有“后人的虚伪的粉饰”，认为必须找寻没有经过后世的影响而“确确实实足以代表古代的那种东西”。于是，超越古史辨派“文籍考订学”的做法，迈出“考古证史”的步履。自1928年8月底起，在两个月的时间里读完了日本东洋文库中所藏甲骨文的著作以及王国维的《观堂集林》，踏进甲骨文的研究领域。一面攻读，一面考释，完成了《卜辞中的古代社会》这一长篇论文。观点是根据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摘录”的，材料则以罗振玉、王国维的甲骨文研究为出发点，综合考察了殷商社会的生产状况和组织结构。随后，又以摩尔根《古代社会》和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为“必须知道的准备知识”，将《卜辞中的古代社会》的基本观点浓缩出来，写成《中国社会之历史发展阶段》，概述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西周以前为原始公社制，西周时代为奴隶制，春秋以后为封建制，最近百年为资本制。在准备将以上各篇结集出版之际，又赶写了《周代彝铭中的社会史观》，以青铜器铭文论证西周社会是奴隶社会。1930年3月，上述各篇结为《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由上海联合书店出版，成为代表中国新史学发展方向的开山之作。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针对当时的“国故”之争，在认识上和方法上有着两个重要方面的突破。其一，“跳出”经史子集

的范围，以地下出土实物为出发点，去认识“古代社会之真情实况”。其二，“跳出”传统观念的范围，引进外来的辩证唯物论观念。由此，确立起一个全新的“中国古代文化体系”。如果说30年代初郭沫若在“风雨如晦”的年代推出《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披荆斩棘“开辟草径”，那么到40年代末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等各领风骚的史学新著陆续问世，在中国则已形成一个代表史学发展方向的史学家群体。

尽管《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有“错误的结论”，但具体结论的错误却无法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它是以20年代最新的思想观念——唯物史观为指导，综合了当时最有代表性的两大学术派别——古史辨派、考古证史派的最新成果，确立起自己独特的中国古代文化研究体系，领导了此后的学术文化潮流。

在这之后，郭沫若对于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继续进行探索，不断完善他的奴隶制时代研究体系。40年代作古代研究“自我批判”，从三个方面展开：一是肯定殷代为奴隶社会，二是基本确立起西周奴隶社会说的体系，三是关于战国封建论的一些基本观点大体形成。进入50年代，主要讨论的是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分期问题。《奴隶制时代》一书阐述的三个问题，一是论定殷代为奴隶社会，二是重申西周也是奴隶社会，三是重点研究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变，强调“奴隶制的下限在春秋战国之交”，并认定西汉不是奴隶社会。经过完善的“战国封建论”，成为我国古史分期讨论中颇具影响的一派。1972年发表《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进一步强调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抓住在封建社会中的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这个主要矛盾，而且特别是地主阶级这个矛盾方面，如果在某一个历史时期，不存在严格意义的地主阶级，那个时期的社会便根本不可能是封建社会。